

19

# 广东党史资料

第十四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东党史资料

## 第十四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东党史资料

## 第十四辑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3毫米32开本10印张230,000字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750册

ISBN 7-218-00231-5/K·52

定价：3.00元

# 目 录

## 回 忆 录

- 在香港从事海员工运的回忆……………曾 生 ( 1 )
- 琼纵政治工作的回忆……………陈青山 ( 80 )
- 回忆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在伍观琪部队中的工作  
……………谭丕桓 高永雄 陈狄波 ( 48 )
-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创刊的回忆……………蔡馥生 ( 70 )
- 峥嵘的岁月(六)……………罗文洪 ( 75 )
- 忆东莞抗日敌后的民运工作……………黄炜然 ( 114 )

## 党史专题

- 战斗在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 ( 130 )
- 第十二集团军政工总队内中共地下党组织活动大事纪要  
…………… ( 167 )
- 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四个发展阶段  
……………陈遐璿 卢荻 ( 188 )
- 抗战初期中共广东省委的统一战线工作……………黄建新 ( 195 )
- 抗日战争中的博罗县委……………中共博罗县委党史办公室 ( 224 )
- 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西江的农民武装起义  
……………中共肇庆市委党史办公室 ( 241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广东妇女运动

.....广东妇运史资料编委会工作室 (251)

党史人物

欧日章传略.....中共曲江县委党史办公室 (288)

吴敬业传略.....刘 宣 (294)

问题考证

中共广东党组织几个历史问题的考证.....黄穗生 (305)

# 在香港从事海员工运的回忆

曾 生

## 一 去香港寻找党组织

我由于组织领导广州地区1935年12月9日的抗日大会，并在会后举行的示威游行中冲击了压制学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教育厅，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接着，中山大学停止了我的学籍，广州的中青组织又停止了我们在中山大学中青支部的组织生活。我一心为挽救祖国危亡，满腔热情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不料遭到如此大祸。对于反动政府和学校当局可能对我进行迫害，我有思想准备。可是，广州中青组织对我们的处分，我和钱兴都想不通。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开展，而我自己则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内心十分痛苦。当时，反动派到处通缉我，我为了坚持在广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山大学广大师生的掩护下，仍在中大校内坚持了一段时间。为了避开敌人的追捕，我不得不在一个晚上转换几个地方睡觉。后来，由于环境恶劣，我不能公开

活动了，处境一天比一天困难。于是，我和钱兴认真研究了今后怎么办的问题。钱兴认为：虽然现在反动派到处追捕你，中青又停止了我们的组织生活，但抗日救国的斗争不能停止。怎么办呢？我们应该分开活动，我继续留广州坚持斗争，你到香港去寻找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找到了党组织之后，我们就可以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了。我完全同意钱兴的意见。

1936年1月中旬我到了香港。

香港是世界著名的海港城市。它位于我国广东东南沿岸、珠江口之东，背靠大陆，面临太平洋，为远东航运交通的中转站，航运十分发达。当时香港的中国海员有5万人，其中远洋轮的海员3万人。

我到香港时，香港的航运和中国海员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一）走太平洋航线的有英国的昌兴、太古、士利、亚细亚和渣甸公司，美国的大来公司，中国的招商、三比、政记、永泰公司和挪威的轮船公司，约有轮船100艘至150艘，中国海员约1.5万人。美国大来公司的中国海员1000多人已全部被辞退，美籍华裔海员还留下。

（二）走南洋航线的有美国的铁行、银行、咭行、和丰四公司，荷兰的KMB公司和法国、意大利的轮船公司，约有轮船100多艘，中国海员约1.2万人左右。

（三）走大西洋航线，从香港直接到大西洋的船比较少，大多数是经过南洋，再开往欧洲。直接从香港去大西洋的船，主要是意大利和法国公司的船，其轮船和中国海员的数字不详。只知道意大利船是没有中国海员的，法国船中国海员也比较少。

（四）走印度洋航线主要是荷兰渣华公司的轮船，约有二三十艘，中国海员二三千人。

(五)走沿海航线的有美国太古公司、日本的轮船公司和中国招商、三比、政记三公司。走沿海航线的船，一般吨位都比较小，约有轮船150艘至200艘，中国海员2万人左右。广州失陷之后，沿海航线的海员一下子就有七八千人失业。

上述轮船公司绝大部分是外国的，除了极少数是中国资本的小轮船之外，远洋的轮船、大型的轮船，几乎都是帝国主义国家资本的。他们利用廉价雇佣中国贫苦人当海员，并且利用封建性的行会（馆口）老板包办雇佣权，从中克扣海员的工资，进行封建剥削。当时中国海员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

香港的海员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1922年初，香港海员已组织了工会，并举行了著名的香港海员大罢工。1925年又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因此，我认为通过海员组织可以找到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由于我有不少同乡和亲友是当海员的，平时已对海员有所接触和了解。所以，我到了香港之后，就与香港海员的一个组织“余闲乐社”的负责人廖茂和黄修、肖春、方世林等取得联系。他们知道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因搞抗日救亡运动被反动政府通缉而到香港来的，大家对我都很尊重。我问他们有什么工作给我做？他们研究后要我为余闲乐社办个刊物，叫《余闲》。过了一些时间，廖茂又找我商量，说新界九华径村的居民多姓曾，有许多海员，那里有一间招收该村海员子弟读书的养正学校，希望我能到那里去，帮助把那间学校办好。我接受了这个任务，到九华径养正学校教书。

九华径是香港新界近海一个僻静的小村庄，山青水秀，风景宜人。这里的师生和村民对我非常热情友好，我很快和他们交上了朋友。

当时设在上海的赤色海员总工会写信给余闲乐社，余闲乐社



的负责人廖茂拿信给我看。信的内容是关于如何开展海员工作的问题。我看了之后以为这是共产党的指示。我向廖茂提出：这封信留下让我今晚详细看看。廖茂同意了。我马上把信的全文抄下，秘密回到广州，拿这封信给钱兴看，一起研究下一步该怎么办？当时，我们两人都认为这封信是共产党的指示，通过海员关系是可以找到共产党的组织的。最后，钱兴说：我们是知识分子，工人组织对我们是不会太信任的。要找到党的组织，必须深入到工人中去，使自己成为工人中的一员，并在行动中切实为工人做好事。这样，工人就会相信你，党组织也才会相信你。我觉得这个分析很对。于是，我决心去当一名海员工人。

曾琮年龄与我同岁，论辈数他是我的侄子。我们两人一起读书，从小很要好。他是“日本皇后”轮的二台亚头，在该轮上有一定的威信。于是，我就通过曾琮的关系，到了“日本皇后”轮当了一名海员。

## 二 建立惠坪乐善公所

英国的昌兴轮船公司，以“皇后”命船名，叫“皇后轮”。当时主要有“日本皇后”、“加拿大皇后”、“俄国皇后”和“亚洲皇后”四艘邮船，称之“四大皇后”。“日本皇后”轮是1930年出来代替“法国皇后”轮的。它是四大皇后中比较大的一艘，有9万多吨，船上有中国海员500多人。这些海员一半是从“加拿大皇后”轮上调来的，另一半是从香港招雇来的。在“日本皇后”轮上本来是有中国共产党和赤色工会的支部的，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害，到我上船工作时，已经没有党和赤色工会的组织活动了，甚至余闲乐社的组织活动，也停止了。

有些老党员向我谈到王明“左”倾错误对海员工运严重危害的情况：

1931年至1935年间，赤色海员总工会由于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领导海员斗争时，不顾客观条件的可能，提出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盲目号召罢工、同盟罢工。在斗争策略上，一定要打着赤色工会的旗帜，不肯利用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去团结和组织群众；在斗争中，片面追求大的胜利和影响，盲目地与敌人硬拼，特别是把“俄国皇后”轮搞成赤色堡垒，在香港罢工与武装警察硬拼；在“加拿大皇后”轮殴打乘船的买办梁源和。结果，在各种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海员群众吃尽了苦头，许多人被开除，有的人被逮捕，严重挫伤了广大海员斗争的信心和勇气。特别是每逢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都要求党员和骨干分子带头动员和组织海员，上街游行或在船上举行集会。这样做虽然表示党的存在，表现了革命者不怕牺牲的英勇斗争精神。可是，却暴露了自己，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每一次，都有不少革命骨干和海员群众，遭到敌人残酷的迫害。到后来，有不少海员群众因害怕反动派的迫害，不敢接近海员总工会。总工会送去的宣传品，虽然当面接受了，等工会的人走了，他们不是立即烧掉，就是扔到海里去。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的情况下，仍坚持“左”的错误。1932年“一·二八”事变，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抗日，海员们无比激动，自发地向十九路军捐献、慰问，并把抗日将领蔡廷锴、蒋光鼐，看作民族英雄。可是，一些船上的赤色工会支部，却进行相反的宣传，说“蔡、蒋都是军阀，他们抗日是为了国民党，不应该支持他们。”在“总统号”船上的赤色工会支部，竟提出“工人无祖国”这完全脱离群众的错误口号，反对海

员向抗日的十九路军募捐，打击了海员的爱国热情。结果，船上支部的负责人，被海员们指责为不爱国的人，受到孤立，被迫离船，这个支部也就垮下来了。这样做的结果，严重损害了海员工会的声誉，动摇了海员群众对它的信任。在“左”倾错误的折腾和破坏下，中国的海员工人运动受到了惨重的损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海员总工会转入地下初期，全国赤色海员总工会下属组织的会员仍有1500人以上。仅香港就有800多人。可是，到了1933年底，赤色海员总工会下属的会员不过三四百人。在工会基础最好的外洋轮上的会员，也只剩下108人。在1933年海总负责人廖承志、李大林等被捕之后，党的组织几乎全遭破坏，海员总工会几乎陷于瘫痪。

我到了船上之后，先安排我做听铃的走钟仔，工作很简单：哪个客房的电铃响了，我就去问有什么事要办？按旅客的需要提供服务。每月工资20元港币。当时，船上的海员中大学生只有我一个人。我利用空闲的机会向海员们讲国内外形势，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大家对我很亲热，很尊重。特别是厨房的工人对我很好，我要吃什么，他们都给我吃。很快我就与海员们打成一片了。

在船上，有曾寿隆、张东荃等几位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共产党员和一些老赤色工会会员，他们了解到我是中山大学的学生，因搞抗日救亡运动而被反动派通缉跑到上来当海员这情况之后，都以为我是共产党员，都很信任我，主动找我谈心，向我介绍船上的情况。据他们介绍，以前“日本皇后”轮的余闲乐社是很活跃的。他们在船上搞文娱演出，向乘客进行募捐。所得的钱用来购买保健药品、书刊读物和添置乐器，还为死亡工友的家属筹备救济费用，很受广大海员的支持。后来，由于王明“左”倾错误的危

害，搞了一些过“左”的行动，几次发生殴打外国管理人员的事件。结果，曾金先、黄修等一批骨干被轮船公司开除了，余闲乐社的活动也被船长禁止了。从此，船上冷冷清清，海员们十分苦闷，大家都希望能够恢复活动。

我了解这情况之后，就找曾寿隆、张东荃等人商量。我向他们提出，现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而我们船上则冷冷清清，大家都很苦闷，长此下去不是办法，我们要设法组织大家恢复活动。他们说：我们也很想恢复活动，但船长禁止，搞不好又要被开除，对大家打击更大。我说，以前你们的斗争方式有问题，搞得太激烈，太红了，所以行不通。如果我们改变方式，注意方法，有可能争取船长的同意，把过去的活动恢复起来。他们问：你说有什么好办法？我提出：我们现在不宜公开搞有政治色彩的组织和太激烈的活动了，但可以用灰色组织的形式，比如以组织同乡会，搞慈善活动的名义组织群众，争取各方的支持。我们船上有一批惠阳的海员，坪山人也不少。我的老侄二台亚头曾琮就是坪山人，他在船上有威信，船长也相信他。让我说服他，请他出面在船上由惠阳县坪山的同乡成立一个慈善性质的组织，叫“惠坪乐善公所”。我想，这办法是行得通的。

我们统一了意见之后，我去做曾琮的工作，争取了曾琮的积极支持。于是，由他出面去向船长提出成立“惠坪乐善公所”的申请，并发动大家报名参加。我和曾寿隆等人分头去发动海员报名。结果，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惠坪乐善公所”很快就成立起来了。不仅惠坪属的海员参加，别的海员也参加，人数达100多人。“惠坪乐善公所”成立之后，立即恢复了以前“余闲乐社”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仅组织演戏，进行募捐筹款，做一些慈善福利事业，而且还适当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和募捐活动，很受广大

海员和乘客的欢迎和支持。“日本皇后”轮死气沉沉的局面被打破了，出现了活跃热闹的气氛。见此情景，船长也满意。我们的工作迅速打开了新的局面。后来，我离开“日本皇后”轮之后，在香港又租了一个房间做惠坪乐善公所的办事处，出版了定期刊物《坪潮》。1987年8月，成立“香港海员工会”时，惠坪乐善公所成为其中的一个发起单位。1988年冬，我回坪山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时，惠坪乐善公所又派出宣传慰问团回坪山对我们部队进行慰问，并向家乡的抗日军民演出抗日救亡的文娱节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惠坪乐善公所对恢复海员工运的工作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

由于当时赤色海员总工会的负责人丘金，曾经在“日本皇后”轮做过海员，他与曾寿隆是熟识的，所以，“日本皇后”轮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很快反映到丘金那里。当我在“日本皇后”轮第二次航程从加拿大回香港，途经日本停泊时，我接到了钱兴的来信。他告诉我：现在陈济棠垮台了，余汉谋上台。你可以回来中山大学读书了。王均予已通过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关系找到党的组织，现在他可以在广州发展党员了。你回来广州，可以吸收入党。我顿时心情激动，恨不得立即飞回广州，早日解决渴望已久的入党问题。船经上海停泊时，丘金通过曾寿隆找到了我。曾寿隆向我介绍了丘金的情况之后，我们在旅店租了个房间，谈了一个晚上。他对我很信任，把许多情况都告诉我。当我向他提出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时，丘金说，现在不行，我自己也没有党组织的关系。他鼓励我不要灰心，要努力工作，党组织是会找到的，参党的问题迟早会解决的。最后，我把钱兴来信的情况告诉了丘金。他听后非常高兴，激动地说：太好了。就把香港的赤色工会会员的关

系交给了我，并写了封信给余闲乐社的负责人，要我来领导他们开展工作。从此，我就开始负责香港海员工运的领导工作。

### 三 巧遇抗日将军张炎

1936年5月间，“日本皇后”轮从加拿大的温哥华港开出时，正好抗日将领张炎将军和夫人郑坤廉（原是中山大学的学生）乘坐该轮的头等舱。他在船上看了海员宣传抗日救亡的文艺演出之后，觉得这艘船的抗日气氛特别好，与别的船大不相同。于是，就向一位参加了“惠坪乐善公所”的海员了解情况。他问海员：“你们船上有没有读书人？”海员告诉他：“我们船上不仅有读书人，还有一位中山大学的学生。我们的宣传演出就是他搞起来的。”他听了之后要求那位海员介绍他认识这位大学生。

一天晚上，那位海员来找我。他说住在头等舱那位旅客要我介绍你给他认识。说完就带我去见那位旅客。我一到头等舱的一间房门，一位颇有风度的英俊青年即出来和我握手。他自我介绍说：“我叫张炎，请进内坐。”并介绍他的夫人郑坤廉女士给我认识。张炎将军的名字我听过，但从未见过其人。现在出现在眼前这位大约30岁出头的英俊青年，竟是转战沙场的十九路军抗日名将。他对我满腔热情，非常坦率和诚恳，没有半点架子，很快就交上了朋友。

在从温哥华到香港的航程，我们进行了多次坦率、诚恳的交谈，从国内外形势谈到个人的经历。他告诉我，他是广东吴川县人，出身贫苦家庭，读了几年书就去做工，在药店和茶馆当过工人。二十年代初，他随堂兄张世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在大革命时期，他参加了南征邓本殷，北伐吴佩孚，由勤务兵晋升为营

长。“九·一八”事变后，他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慨。当时，他驻防南京，就与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等将领发起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推举蔡为总指挥，他和翁为两个独立旅的旅长，请缨北上抗日。正当他们准备出发之际，“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了。他接到上海十九路军总部的命令，连夜率领六十一师（辖两个旅）开赴上海，参加抗战。他指挥的部队打得很顽强，与日军浴血奋战，重创敌军，并配合友军，击退日军“久留米”名牌师团主力的进攻。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十九路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英勇战斗，毙伤敌1万余人，多次粉碎敌人的进攻，迫使日军三易其帅。但是，由于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致使十九路军撤出上海，并与日本签订了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1938年初，日军占领了东北三省之后，又侵占热河和察哈尔北部，并向长城各口进攻，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抗日救国，他又与蔡廷锴、谭启秀（七十八师副师长）组织“援热先遣军”，再次请缨北上抗日。但当先遣军到达耒阳时，国民党政府已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命令先遣军回师，开赴福建进行反共内战，北上抗日的愿望终未能实现。在几经挫折之后，他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要实现抗日救国，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最大障碍。于是，他积极参加了1938年冬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部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在福建组织“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福建事变前，他接任独立第四十九师师长。福建事变后，他任第四军军长。可是，在蒋介石重兵进攻和以重金、高官收买下，很快失败了。蒋介石派杨水森做他的工作，答应委任他为第七路军副总指挥，替蒋介石

石进行反共内战。如不愿干，则给6万元让他出国“游历”。他拒绝了蒋介石的委任，被迫出国“游历”了。在海外飘泊期间，他深感身为一位军人，在大敌入侵的时候退出沙场，万分惭愧。当他听到绥远抗战的消息，即动身回国。

他问我：“你为什么到船上来当海员呢？”我把自己从澳大利亚回国读书，到由于参加领导中山大学和广州地区的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而遭到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通缉，然后到船上来当船员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他听了之后，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目前敌人一步步入侵国土，而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许人民起来抗战。所以，当前的民族危机是十分严重的。为挽救祖国的危亡，必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必须发动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战。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随时都有敌人入侵的可能，我们更应该加紧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一旦敌人入侵广东，我就组织海员和港澳同胞回家乡组织民众抗日武装，进行保家卫国的抗日游击战争。他听着不断地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

当船快到日本横滨港停泊的时候，张炎将军提出要我陪他一起去东京玩。但当我们穿好了衣服，准备起程的时候，他考虑到怕日本特务认出他会找麻烦，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去了。船到达目的地香港的时候，我送他夫妇上岸。我们依依不舍地握手告别。他要求我给他留下地址，希望以后能经常联系。

1989年夏天，我从惠阳游击区到香港联系工作时，聂永年先生通过我母亲的义妹找到了我。聂先生是张炎将军的好友。我回国读书时，他在中山大学搞庶务工作。他为人热情，乐于助人。我是在他的帮助下到中山大学附中读书的。多年未见，两人十分高兴。我们坐下，聂先生就说：“这回是张炎将军派我专程来找你



的。张炎将军现在就任第一区游击司令，辖高州六属和两阳一带。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渴望得到共产党的支持。他曾几次派人到香港寻找你，希望你能到南路同他一起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抗日武装。去年派人到香港找你未遇，后来通过廖承志、连贯的关系，由香港学生赈济会派了一个青年回乡服务团20多人到南路，协助张将军开展工作。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已组织起一支武装，他非常希望你能到南路去，助他一臂之力，共同搞好南路的抗日大业。”

我听了聂先生的介绍，对张炎将军的爱国热情和才干，甚为钦佩；对南路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感到十分兴奋。可惜，我不能满足张炎将军的要求。因为我已在东江建立起一支抗日部队，党组织已决定我在东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于是，我把这情况告诉聂先生，请他转告张炎将军，我感谢他的盛情邀请，并请他体谅。

1945年夏天，我的侄子曾天福（他在南路和张炎将军一起工作，曾任第三党的组织部长。解放前夕，在上海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来见我。他是在张炎起义失败，脱险之后来找我的。他向我谈了张炎将军在南路热情支持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他毁家纾难，变卖家业，筹款抗日；他抗击权贵，惩办汉奸林绳武、许宝石，他热爱青年，又释爱国青年共产党员周崇和（现名罗文洪）、文允斌。他的爱国行动，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满。1940年夏天，国民党顽固派以“赤化南路”等莫须有罪名，迫张炎辞职。张将军被迫避居香港。1944年秋，在李济深、张发奎（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支持下，又回到南路，组织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六七百人的队伍。国民党顽固派对张炎将军大力发展民众抗日武装十分恐惧和仇视。于是，派特务监视他的行动，并于1944年冬调重